

改革与战略丛书之一

探索改革发展之路

孙可庸 袁绪程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改革与战略丛书编委:

主任: 骆 明

委员 (以姓氏笔划为序): 马 飏 朱 荣

何异煌 孙可庸 张江坝 张中睦

范 阳 骆 明 陈 彤 袁绪程

梁 宁 郭 明 詹宏松 黎守法

探索改革发展之路

孙可庸 袁绪程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育才路3号)

广西社会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1/32 印张14.6 字数320千字

1988年12月第1版, 1988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8001—1000

ISBN 7-5633-321-9/C.001

定价: 4.00元

前 言

收在这本集子里的，是袁绪程同志和我从事经济理论学习研究工作后发表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部分论文和研究报告。随着改革与实践的前进，人们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今天回头看看几年来的劳作，感到这些文章（尤其是属于我个人的部分）显得很成熟、很不深刻；不过，我想，自然没有必要将今天（包括客我）的“深化”，人为地烙到过去的作品上去；因此，我们依照当初发表的本来面貌，将其汇集在一起，以志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和改革进行十周年的纪念。同时，我想，回顾自己幼稚蹒跚而行留下的脚印，对争取今后脚步走得更稳健一点，或许有所裨益。这也是本集子取名《探索改革发展之路》的一点意思，欢迎大家批评指点。

本论文集承张中随同志负责繁多的编辑、校对、及其他编务工作，特此致谢。

孙可庸

1988年10月于南宁

目 录

前 言

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论.....	(1)
——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依据	
还是提“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好.....	(55)
关于经济领导体制改革的思考.....	(59)
关于经济体制目标模式的探索.....	(76)
经济体制改革若干问题探讨.....	(97)
生产价格制势在必行	(112)
——对当前经济改革中几个具体问题的探讨	
就部门与企业的关系谈谈生产价格讨论中的	
几个问题	(125)
《资本论》(第三卷)与社会主义生产价格制.....	(129)
社会主义生产价格制中的 C 、 c 、 V 、 m (P) 和 P' ...	(147)
附：《社会主义生产价格论(大纲)》(草稿)	
(要点提示)	(168)
三谈广西战略指导思想	(176)
广西战略指导思想浅析	(176)

再谈广西（城市）战略指导思想	(190)
三谈广西战略指导思想	(197)
——把广西发展放在横向联系中筹划	
横向经济初探	(205)
深入改革，加速发展	(218)
——广西经济体制改革与发展问题综合研究报告	
把改革与发展更好地结合起来	(251)
广西社会经济情势综合研究	(256)
广西内外关系考察研究	(285)
发展中的广西乡镇企业：问题与选择	(311)
西部民办企业与所有制变革	(346)
关于发展西南交通运输业的若干问题	
.....	(358)
关于进一步改革农产品价格的思路	(379)
深化金融改革的飞跃	(395)
附：关于房租改革的初步意见	(415)
柳州的探索与省（区）辖城市的改革	(421)
南宁市经济发展与改革西临的问题及选择	(446)

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论

——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依据

袁绪程 孙可庸

何谓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它的性质、特征、结构、规律、体制是什么？它在历史上处于何种地位？本文拟作粗浅的探讨。

一、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在描述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之前，让我们简略地回顾一下前辈们对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所经历的痛苦而又曲折的认识过程。正像人们所熟知的那样，在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中不存在商品生产。这对于生活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初始阶段并对其弊病有切肤之痛的人们来说，几乎是无须证明的真理。那时的人们至诚地相信。在未来的共产主义千年王国中，自由平等的劳动取代了“肮脏”的现金（商品）交易；一切的一切纯而又纯。然而，生活在今天的商品世界的人们却感到扑朔迷离。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存在商品生产呢？我们怎么能够设想一个没有交换的世界呢？人们苦思冥想，进行了无穷无尽的猜测，无休无止的争论，但未必能够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多数人显然没有注意到，马克思的非商品生产的社会主义设想并非道义的产物或基督教似的信条，而是源于生产社会化原理的科学假说。不理解生产社会

化原理，就不理解这个假说。马克思生产社会化原理第一次深刻地揭示了人类社会生产的进化规律，令人信服地指出了人类生产活动随着劳动手段和劳动对象的变更不断地趋向于社会化。——即从狭小的、简单的、低级的社会化趋向于扩大的、复杂的、高级的社会化。换句话说，生产的社会化是人类生存的经济系统的有序程度不断增大的不可逆的过程，是从封闭的、较小孤立系统趋向于协同的、开放的、自组织的、较大的系统的过程。这个过程虽不可避免地采取了商品生产的形式，但随着自身的发展它将最终蜕变为商品形式。进入自我调节的完全社会化的经济系统——这就是马克思设想的直接社会化经济。

为了理解生产社会化原理及马克思的设想，首先必须弄清马克思生产社会化和直接社会化的含义。从马克思著述看，生产的社会化，指生产的社会（群体）性质。人们通常指的生产活动自身的结构的社会化。如果可以概括的话，它包括：1. 生产要素使用的社会化。即生产要素在整个社会大系统中相对自由流动。就这一点而言，任何自给性生产都不存在生产要素使用的社会化，它们在本质上是排斥生产要素的社会性使用的。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则是生产要素的使用趋向社会化的生产方式。但生产要素的资本主义方式的使用的社会化是有限度的。因为资本的私人占有阻碍了生产要素的社会性使用向更高层次发展。在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中，生产要素社会性的使用则是自由的。2. 生产过程的社会化。即任何一个生产单位，当作个别的生产过程，既是社会局部分工和协作的过程，又是社会整体分工和协作过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任何一个个别的生产过程既是前一个生

产过程的继续和后一个生产过程的开端，又是社会整体生产中的一个环节。“社会”为“个别”生产。“个别”为“社会”生产。彼此为对方生产。相互独立又相互依赖。从这个意义看，自给性生产方式不存在生产过程的社会化，而在发展了的商品生产中，生产过程的社会化则是其显著特征。关于生产要素（使用）和生产过程的社会化，恩格斯和列宁都有过专门的论述。恩格斯在说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化时指出：“……有限的生产资料从个人的生产资料变为社会化的，即只能由大批人共同使用的生产资料……。和生产资料一样，生产本身也是一系列的个人行动变为一系列的社会行动，而产品也从个人的产品变成了社会的产品……没有一个人能够说，这是我做的，这是我的产品。”①列宁在批驳把生产的社会化曲解为劳动场所的集中化时指出，生产的社会化，“这并不是说人们在一个场所内工作（这只是过程的一小部分），而是说……许多分散的生产过程融合成一个社会生产过程。”②3.生产的最终结果——消费品的使用社会化。在自给性生产中，每一生产单位的消费品基本上自给。例如，自给自足的农户吃自己种的粮，穿自己制的衣，住自己盖的房。在发展了的商品生产中，生产者通过货币交换，既可消费自己的产品也可消费他人生产的产品，而不受自己的产品限制。随着信用制度的进步，消费品的社会性的使用程度在不断提高，从物物交换到电子银行和消费信用卡，不能不承认资本主义生产的消费品的社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

由上可见，任何社会化生产应当具有生产要素，生产过程及生产结果（使用）的社会化等三大特征，若以此作为标志和衡量尺度，那末，日本现代的一家一户的农业生产是社

会化的大生产。正在我国农村兴起的专业户生产也是趋向于社会化的大生产。过去农村的多数生产队的“集体”生产则是自给性和半自给性的小生产。

现在来看生产直接社会化的含义。在马克思的著述中，生产的直接社会化指生产的组织、控制、分配、消费等职能的直接社会化。概括起来有如下几个方面：

1.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剥夺资本后，将把国家吞噬的一切权力还给社会。③无产阶级国家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过渡到社会直接占有生产资料。国家的政治权力开始消亡，其社会职能演变为社会全体成员的自治。④

2. 消灭任何“阶级”的所有权，实现“个人”的所有权——即联合起来的个人占有生产资料的权力。⑤从而使所有权失去排他性的私有的性质，还原为个人自由劳动的社会条件。

3. 由于不需要政治权力或货币交换的媒介，个人劳动和社会劳动具有直接的同一性，从而实现全社会的直接联合劳动。

4. 劳动的直接的社会联合表现为全社会的直接民主管理体制。马克思高度赞扬过巴黎公社政治上的直接民主制，也充分肯定过未来社会的经济生活的直接民主制。他在痛斥巴枯宁污蔑共产主义为集权专制时指出：“如果巴枯宁先生熟悉工人合作社的管理者的情况，那末他的关于统治权的全部谬论就会破产。他势必问问自己：在这种工人国家（要是他愿意这样称呼）的基础上，管理的职能能够采取什么形式。”⑥众所周知，工人合作社的管理具有直接民主制的特征。虽然这是一种局部范围内的直接民主制的低级形式，但

并不妨碍马克思以此类推共产主义社会范围内的较高级的直接民主制。⑦

5. 根据社会全体成员的需要进行有计划按比例地分配社会劳动。直接借助计划控制和调节社会生产。如此等等。

马克思就是按照上述五个方面，勾画出未来社会主义的抽象轮廓的。不难看出，在这样的社会中，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等职能既然已被劳动的直接社会性质所规定，商品生产的消亡就是自然而然的了。问题在于，马克思没有对未来社会的直接社会化的生产方式作出具体的描述，他仅限于抽象的想象和一般原则的推论。这无疑是对的。因为任何具体的描述都会把自己置于空想和荒谬的境地。不妨试想一下，而对着数以百万计的分布在世界各地的不同类型的企业以及金字塔式的管理组织，数十亿的不同职能的生产者，不计其数的产品，怎么能够设想直接民主制的具体形式呢？怎么能够设想直接的计划调节呢？如果没有阿拉伯神灯式的新的生产资料供人们想象，这显然是不可思议的。马克思坚信历史会作出回答。在此之前，“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⑧但是，只有具备马克思这样的逻辑头脑的人才会满足于未来社会的抽象议论，多数人宁肯要一个具体的、形象的、能够在经验中直感到的社会主义。人们的企求无疑是过高了。马克思不是神而是人。他不可能想象一个谁也没有经历过的新社会的具体模样。正如恩格斯在人们盼望已久的《资本论》出版时写道：“这本书会使某些读者很失望。……而另一些读者在终于看到它出版的消息后，可能会以为他从这本书里会知道共产主义的千年王国看来到底是什么样子。谁期望得到这种愉快，谁就会大错特错了。……马克思现

在是，而且将来仍然是始终如一的革命家，并且在自己的科学著作中没有人像他那样毫不掩盖自己的这些观点。可是关于社会变革后将怎样，他只是一般地谈到。”⑨马克思比任何同时代人都深知，变革后的社会的具体描述有赖于社会生产的物质条件——生产力的变革的具体把握。当比资本主义生产更高更新的物质条件尚没有出现时，关于商品生产消亡后的新社会，只能从理论上“一般地谈到，”而不能作经验的描述。正如爱因斯坦所说，“人不能看到和直觉地想象第四维”但能够从数学上把握四维空间。⑩同样，人们不能从经验中直感到商品生产消亡后的具体情景，但人们可以在理论上描导出商品生产的消亡和直接社会化生产方式的到来。显而易见的是，对于谁也没有经历过的新社会，如果非要诉诸于经验的想象，那必定是用自给性生产方式想象直接社会化生产方式；用原始的平均主义想象社会主义分配方式；用依附性的行政方式想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直接民主制；用集权控制的实物配给制想象社会主义的计划控制。一句话，用放大的、变了形的自然经济想象社会主义经济。

由此可见，既然直接社会化生产方式只能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过程，既然任何人都不能直感到未来的生产力的具体特征，马克思没有对直接社会化的生产方式作出进一步的具体描述，而是仅限于抽象的设想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对直接社会化的生产方式仅作过抽象的设想，那末他对于生产的直接社会化的历史过程则作过许多具体的描述。他指出，通向生产的直接社会化是一个漫长、历史的自然过程，而不仅仅是一个终极目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第一次冲破了大大小小的自然经济的篱笆，把被束

缚的各种生产要素游离出来加以社会性使用的时候，生产过程和生产的最终产品（使用）也开始了社会化。它不仅迫使本民族的生产社会化，而且“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⑪从而使全世界的生产趋向于社会化。正如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⑫通过资本的集中、股份公司和信用制度而迅速社会化的生产反过来要求占有的社会化。实际上，股份公司和信用制度本身就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限度内的占有的某种程度的社会化。因为股份公司的资本“建立在一种社会的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并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社会集中为前提的资本，在这里直接取得了社会资本（即那些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资本）的形式，而与私人资本相对立，并且它的企业也表现为社会企业，而与私人企业相对立，这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⑬“在股份公司内部，职能已经和资本所有权相分离，因而劳动也已经完全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剩余劳动的所有权相分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财产必需的过渡点。……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直接的社会财产。”^⑭马克思预言，随着生产的进一步社会化，消除资本的任何形式的私有制，实现社会占有生产资料的社会革命也就不可避免地到来了。

然而在新的生产力尚未出现，在生产的社会化过程尚未最后完成之前，能否通过革命消除商品生产，实现直接社会化的生产方式？马克思本人并未作出直接回答。甚至对于刚刚开始社会化的不发达国家革命后的具体前景也未涉及。如

果根据马克思生产社会化原理，回答当然就否定的，因为革命只是新社会的助产婆，而非新社会本身。革命不能解决生产的社会化的问题，只能解决生产资料归谁所有的问题。因此，从自然经济转变的商品经济，再从商品经济转变为直接社会化经济，本质上由生产力、生产的社会化的历史进程所规定。商品经济不是革命所能废除的，而是到一定的历史阶段自然地逐渐地消亡的。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在后面还要详细地论述。

令人遗憾的是，马克思的同时代人却忽略了马克思生产社会化原理，只是记住了关于未来社会不存在商品生产的结论。他们也没有深究未来的社会为何不存在商品生产的。却错误地把消除商品生产当作社会革命的目标之一，并作为不可逾越的教条一代代传下去。（时至今日许多人还无法摆脱它的影响，仍把商品生产当作社会主义的大敌。）这就给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探索投下了沉重的阴影；使得后来的人们走过了一条迷惘而又艰辛的再认识道路。

列宁领导十月革命的胜利开创了人类走向社会主义的新纪元，也给消除商品生产的教条提供了实践的机会。列宁和同时代的其他马克思主义者一样，深受传统的教条影响，相信“社会主义就是消灭商品经济。”^⑭“须知要组织没有企业主参加的大生产，首先就必须消灭社会经济的商品组织”。^⑮鉴于俄国生产力的落后，列宁摒弃了立即消除商品经济的“左派共产主义”的空谈；主张从利用商品交换过渡到消除商品交换。但是，由于帝国主义野蛮的武装干涉，破坏巨大的国内战争，迫使列宁改变了主张，转向被人们称为战时共产主义的政策，实行全面的实物配给制；然而在整个

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商品货币关系并非被真正地消除，只是被暂时地禁止。公开的商品交换虽被严加禁止，但无法禁止普遍性的物物交换（以物易物）和投机性的黑市交易。战时共产主义的实物经济制虽然对于战争的胜利起了巨大的作用，但未能使濒于瘫痪的经济复苏。相反地，严重的开工不足，效率的低下，黑市投机带来混乱，需求的匮乏却齐头并进，互为因果、恶性循环。从表面看，战时共产主义似乎是跳过商品经济向直接社会化经济的“跃进”，实际上却是向放大的自然经济——实物经济的回复。它不可能适应现代生产力的发展，它的失败也是不可避免的。禁止商品交换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失败使列宁比任何人都更深刻地领悟到，要恢复经济秩序，复苏生产力，别无他法，只有实行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随着国内战争的结束，列宁立即提出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转变为新经济政策的主张。这种转变不论在当时是否作为权宜之计，其影响都不可低估。新经济政策集中到一点，就是实物经济商品化，从国家统制的实物经济转向国家控制和调节的商品经济。从而也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列宁指出，“新经济政策并不是改变统一的国家经济计划，不是要超越这个计划的范围，而是要改变实现这个计划的方法。”^{①⑥}这就意味着用经济的方法而不是用行政的方法去实现计划，把经济计划置于价值规律而不是置于行政命令的基础上。这就需要大力发展商业，竭尽全力疏通商品流通的渠道。列宁号召全党学习经商，“我们决不受轻视商业的‘感情的社会主义’或旧俄国式、半贵族式、半农民式、宗法式的情绪的支配。”^{①⑦}指出，在国家正确调节（指导）下，活跃国内商业。“商业正是我们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必须全力

抓住的环节’。”^{①9}

在当时的极度困难条件下，列宁毅然冲破正统教条的束缚，实行新经济政策，是异常伟大的，为后代人作出实事求是的榜样。新经济政策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它甚至启迪着今天的人们——如我国的特区政策。无论怎样评价也不会过高。新经济政策所倡导的商品交换虽是在不同所有制经济之间进行，但仍不失普遍性。因为不同所有制经济之间的交换必然要求同一所有制经济内的交换。可以认为，新经济政策为复苏和发展年轻的苏维埃经济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另一方面，开创了把商品货币关系引入社会主义建设的先例，给全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者重新认识商品生产提供了理论概括的机会。虽然列宁本人的过早逝世使他来不及和旧的教条彻底决裂，概括出一整套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完整理论，但他所留下的新经济政策，以及关于经济的理论基础是事实而不是教条，关于不能根据书本、只能根据社会主义的实践来认识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教导，无疑像不朽的箴言，告诫着下一代继续探索，以揭示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之谜。

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对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他正确地拒绝了立即消除货币的“左派”式的清谈，主张在一定的范围内利用货币关系。但令人遗憾的是，他仍然把消除商品生产当作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他没有对新经济政策的成功经验进行高度的理论概括，从生产社会化的角度揭示商品交换的历史必然性，而是把新经济政策时期的商品交换，视为由于存在多种所有制而不得不采取的“权宜之计”。因此斯大林认为，随着苏联的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已受到严

格的限制，如果它存在某些领域的话，那是因为农村仍然是集体所有制。一旦集体所有制变为国家所有制，就可以用一个“有权支配全国一切消费品的无所不包的部门”来代替商品交换。于是社会就从限制商品生产过渡到直接的产品交换，最后进入没有交换的“共产主义社会”。这就是斯大林限制商品生产的理论。^⑩其错误是极其明显的。

第一，一定的生产方式决定占有方式及所有制关系。作为一定的生产方式的商品生产存在并非由于两种公有制的并存。而是有着更深刻的经济原因。因此，即使实现了单一的国有制，也不可能废除商品生产。相反地，商品生产的存在则要求国有制社会化——成为与商品生产相适应的社会所有制。

第二，限制和消除商品就会倒退到自然经济，当然不是原来的自然经济，而是放大的自然经济——实物经济。因此，设想一个“有权支配全国一切消费品的无所不包的部门”代替商品交换既不符合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又是不切实际的。

然而不幸的是，斯大林限制商品生产的理论却统治了整整一代人的头脑。那时候的苏联理论经济学家们除了给限制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现行政策小心翼翼地作注释外，不知道还有什么更好的事可做。因此也就谈不上发展新经济政策时期的商品生产理论。

耐人寻味的是，限制商品生产理论不但在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发生，而且也在对苏联持批评态度的西方新老“左派”中得到反响。这颇有一点异曲同工。从把商品、货币、市场、价格等等范畴视为与社会主义不相容的传统观念出发，

西方新老“左派马克思主义者”都先后提出限制和消除商品生产（交换）的观点。例如，比利时的埃内斯库·曼德尔认为现今的苏联无疑“具备了允许市场开始消失的条件。”^{②0}美国的保罗·斯威齐认为“市场关系（当然，这意味着货币和价格）在社会主义的一个长期内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种关系乃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一种常驻的危险，如果不加以严格的限制和控制，会导致变质和倒退。”^{②1}曼德尔、斯威齐等人的观点显然是对马克思的非商品生产的社会主义设想采取教条主义的结果。

对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理论的探索有开创意义的却是由另一类型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如波兰人奥斯卡·兰格等作出的。兰格等最先从理论上把市场引进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深刻地揭示了价格在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中的各项（取得信息，经济测算，分配资源等）调节职能。既证明了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的可能性，又保持了商品生产的组织结构。从而把社会主义和商品生产有机地联系起来。正如奥·锡克指出的那样，“兰格的最大功绩，就在于他从存在着生产替代作用和消费替代作用这一观点出发，强调生产结构问题，并强调各种可供选择的解决方式以及价格对于保证最有效解决办法的意义。遗憾的是，他对市场问题的解释并没有揭示社会主义制度下这一现象的社会经济实质……。他不能不受到在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中流行的关于市场机制和社会主义计划性不可能同时发生作用这一普遍观点的影响。他试图从中央制定平衡价格以补充和代替市场职能的办法中去寻找出路，与此同时，他过于迁就对于社会主义计划性的行政强加的以解释。”^{②2}应当说，兰格的缺陷，除正统的教条对他的束缚